



首页 → 学术文章 → 环境伦理

王丰年：生态价值视野中的环境教育——从生态价值看我国的环境教育

生态价值视野中的环境教育 ——从生态价值看我国的环境教育

【原文出处】自然辩证法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75

【原刊页号】74~77

【分类号】N2

【分类名】生态环境与保护

【复印期号】200708

【作者】王丰年

【作者简介】王丰年，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北京 100084

王丰年，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博士，副教授。

文章编号：1000—8934（2007）05—0074—04

当今时代，影响人类生活的一些全球性环境问题，诸如人类生存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自然资源日趋枯竭、世界人口呈爆炸趋势制约着可持续发展。虽然人们意识到了环境恶化的危害，但是，人类依然不能有效地扭转日趋恶化的环境状况。这就要求人们透过环境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探讨价值观等深层原因，反思传统的价值观以及由此引发的环境教育问题。

1 环境教育的生态价值转向

千百年以来，指导人们改造自然的价值取向是人类中心主义，并且成为一代又一代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综观人类文明史，迄今为止的现代文明建立在人类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思想基础上。由于利益的驱动，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人们一直是以追求自身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动力。学校教育也是传播这种观念，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认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们可以无偿使用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自然资源无主，谁开发，谁就拥有。工业革命以前的价值观以人统治自然为指导思想，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经济、增加物质财富、满足人类物质需要当作判断自身行为是否合理的价值标准。按照这样的价值标准，无论采取什么样方式和手段向自然界索取都是合理的。罗尔斯顿提出价值并不完全是人类主观经历的产物，价值存在于自然界中，它是客观的，“苔藓在阿巴拉契山的南段生长得极为繁茂，因为似乎别人都不怎么关心它们。但它们就在那里，不顾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话，也不给人带来什么好处，只是自己繁茂地生长着。的确，整个自然界都是那样——森林和土壤、阳光和雨水、河流和山峰、循环的四季、野生花草和野生动物——所有这些从来就存在的自然事物，支撑着其他一切。人类傲慢地认为‘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可这些自然事物是在人类之前就已存在了。这个可贵的世界，这个人类能够评价的世界，不是没有价值的；正相反，是它产生了价值——在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它更接近终极存在。”[1]

毋庸置疑，在这种自然价值观的支配下，人类在征服自然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2]这种价值观具有“反自然”性质，因为以它为指导的人类活动对自然界造成了严重损害。[3]日益严峻的环境现状要求人类不仅承认人的价值，也要承认生命和自然界的价值，相应地，人类需要对传统价值观背景下的环境教育进行反思。

鉴于以上分析，作者认为应当把自然环境纳入价值生产过程，价值的分配也应当对它进行补偿和积累。人类需要通过自然价值观的转变，改变文化发展方向，从而使人类在自然价值基础上创造文化价值。环境教育要使人们意识到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价值，以正确的态度来谋求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正如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所说“要消除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只有通过每一个人的内心的革命性变革。”[4]科学地对待自然界一旦成为人的内在需要，人类对自然的保护才能真正实施。所以，应该要求转变传统的教育模式。

2 国际视野中的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自然研究，当时在学校开展自然研究的目的是教育学生通过亲身观察，了解自然环境。20世纪初，人们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环保运动在社会中形成，学校教育也在自然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了自然保护的教育内容，这就是环境教育的萌芽。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教育在发达国家迅速发展，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环境教育”这一名词的诞生追溯到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首届“人类环境会议”上，113个国家以及联合国机构和非官方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提出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著名口号，并正式将“环境教育”名称确定下来，这次会议被认为是环境教育的里程碑。在这一阶段，虽然人类对环境教育的认识只停留于制定规范的层面上，但是，对约束人们的行为并使其符合外在规范的范畴具有积极意义。

197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国际环境教育研讨会，来自65个国家的教育官员、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这是有史以来以环境教育为专题的国际性会议，通过了《贝尔格莱德宪章》，提出了环境教育的目标是促进全人类认识和关心环境，并且为个人和集体提供解决环境问题的知识、技能、态度、动机和义务。在这一阶段，人类对环境教育的认识已不再是遵守外在的行为规范，而是上升到人的情感、认知领域。环境教育不仅仅培养人们遵守规范，而且要培养人们有自觉意识并自觉采取环境保护行动。

1992年6月，联合国组织召开了各国政府首脑参加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21世纪议程》论述了环境教育

的重要任务，强调环境教育要重新定向，要通过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环境、掌握解决环境问题的相关知识和技术，向促使人们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提高有效参与解决环境问题的技能方向转变提出“教育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和发展问题的能力的关键”。[5]由此看出，人类对环境教育的认识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都有了扩展，环境教育不仅解决人类现在面临的问题，更要考虑到今天的行为对未来造成的影响；不仅要关心自己这一代人的幸福，也要关心子孙后代的幸福。

综观环境教育的历程，我国在制定环境教育的方针、条例的过程中，无疑还缺乏从自然界的内在机理、内在价值的高度研究环境教育的规律。

3 我国环境教育的国际差距

在1973年的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上，我国首次提出环境教育。1992年，全国首届环境教育工作会议在苏州召开，标志着我国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教育体系。1996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国家环保局、中宣部、国家教育部联合发出《全国环境教育宣传行动纲要》，指出环境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素质的基本手段之一，明确规定了环境教育、环境宣传、国际合作、能力建设4个领域的目标和行动。限于我国目前中小学课时的紧张和学生的过重课业负担，环境教育迄今仍然没有独立开设，中小学没有列为必修课。和西方国家的环境教育相比，我国的环境教育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与我国环境保护现状和发展趋势不相适应。

(1) 学科分类的局限性 传统科学把统一的物质世界分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科学分别沿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方向独立地发展：社会科学从人的社会关系的角度，自然科学则从人的自然关系的角度，完全分割地进行研究。这样，就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知识体系。

由于方法论的偏差，这种方法论支持下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背离了真实世界的性质。虽然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但是，人类社会、自然界是一个统一整体，两者的本质区别正是它们相互统一的条件；并且这种本质区别越强烈，它们的统一就越丰富、深刻。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比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别更为重要[6]。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提出了发展交叉学科的要求，呼唤科学的融合；而在我国的现行教育体制下，从中学就开始分文、理科，不利于学生对自然机理的掌握和对环境保护历史责任感的理解。似乎向自然界索取的越多，创造的财富越多，就越能够体现自身价值，导致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环境保护是一门跨学科的交叉学科，是连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环境教育既需要自然科学知识，也需要社会科学知识。

(2) 注重应试教育，忽视素质教育 我国目前的教育依然是应试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升学。这种教育体制下培养的学生难以承担可持续发展的重任。当环境教育与其他课程相冲突时，往往以牺牲环境教育为代价。虽然环境教育已经列入国家中小学教学大纲，但是，许多城市中、小学生缺乏常见动物、植物保护知识。因此，应该将环境教育纳入幼儿园、中小学、大学、成人教育课程。特别是在中学教育中，学生把升学作为第一要务，所有一切社会活动放在次要位置。许多理工院校类的对学生毕业设计的要求涉及经济效益、政治效益，忽视毕业设计的环境效益。学校为不同行业、部门培养决策者、管理者和执行者，如果高校没有对学生进行有效的环境教育，那么，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就不可能正确地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许多人在专业知识上可以胜任工作，但是，由于缺乏环境意识，在其工作、生活中，不能够身体力行地进行环境保护。从小学到大学的素质教育是提高政治素质、文化素质、专业技能、生态素质的全面教育，学生环保意识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环境状况的质量。

(3) 环境教育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环境教育是多学科的整合教育，不是由单一科目、某类专长教师所能满足，而是一个持续性的环境教育计划有助于学生的生态意识、环境伦理及环境行为责任的培养。因此，在实施环境教育过程中，有必要制订一套有计划的环境教育计划。

(4) 环境教育投入不够 环境教育的进展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因此，对环境教育投入的多少直接制约着它的发展程度。我国环境教育总体上投入不够，很多进行环境教育的老师自身并非环境专业毕业，未接受系统的培训，有些学校的环境教育教师甚至是其他课程教师兼任的，有些省、市没有设专门的环境宣传机构，县一级的环境宣传机构更少，环境保护的专业管理人员不足。环境教育的教材滞后于教育，一些教材知识陈旧，缺乏新理论，很少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活动，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4 我国环境教育的对策

环境教育关系到一个国家环境道德的培养，应该成为人们的终身教育。生态价值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衡量一个民族文化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新的自然价值观背景下的环境教育不仅是涉及多学科的综合教育，而且其实施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涉及人们的自然观、学科分类、新闻媒体等方面，是一项全社会的系统工程。

(1) 关注环境教育的层次性 对小学生的环境教育要浅显，利用课外活动进行渗透。在中学，要引导中学生关注环境问题，让他们在受教育、学知识、长身体的同时，树立热爱大自然、保护地球家园的高尚情操和培养对环境负责的行为。在大学阶段，我国环境学科专业的环境教育日趋完善，但是，非环境学科学生的环境教育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综观大学校园的环境状况和大学生们的环境行为，我国大学生的环境意识还处于较低层次，因此，高等教育应该加入可持续发展教育和环境教育，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原则、指导思想落实到大学生的各项活动中，融入大学教育的全过程。用绿色教育思想培养人，用绿色科技意识开展科学研究，用绿色校园示范熏陶人，使学生们毕业后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骨干和核心力量。各级领导干部对地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既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又要把资源环境保护抓好，就必须加强资源环境保护知识的学习。对普通公民的环境教育是整个环境教育中最薄弱的环节，在“利益最大化”驱使下，常常把内部成本外部化，扭曲的竞争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由此诱导出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推给了政府部门。从幼年到老年，环境教育要贯穿于每个公民的一生。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

(2) 完善环境教育形式 我国中小学的环境教育侧重灌输环境科学知识为主，强调急于求成、立竿见影，没有着眼于未来发展。诚然，强调“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爱国之情教育非常必要，但是，同时也产生了盲目乐观的心理，以致造成中小生长大以后不珍惜生物资源的现象。环境教育不仅注重课堂教学，还注重课外活动，全方位地提高学生的素质。像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活动，到受污染严重的河流、居民区做实地考察采访，写成调查报告，使学生了解了环境知识，提高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自觉性，促使学生形成自然资源枯竭的危机意识，产生保护自然资源的责任感。现在，高校学生的毕业设计仅仅局限在专业知识范围，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评价毕业设计的重要指标，忽视了环境效益，所以，理工科院校学生的毕业设计应该将环境目标列入毕业设计，以提高大学环境教育的实践意义。

(3) 借鉴发达国家的环境教育经验 环境教育课程是一门新兴课程，强调把环境教育并入中小学课程，有的国家还设立了独立的环境教育课。美国的佐治亚大学、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在建绿色大学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其对社会、政府决策的环保功能。1998年6月，全国首家“绿色大学示范工程”在清华大学正式启动，“绿色大学”建设主要包括“绿色教育”、“绿色科技”和“绿色校园”，这对推动全国创建“绿色大学”活动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学校教育注重学生毕业后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也更多地重视经济指标，较少地考虑环境指标。建设“绿色大学”是一种教育模式的转变，对于我国的环境教育具有示范作用。

(4) 加强新闻媒体的正确引导 在信息社会，人们每天都在接受大量信息，而许多信息是通过新闻媒体传播的。环境教育就是要通过报刊、电视、宣传画、黑板报等大众化形式，传授生态平衡、能源分布与消耗、资源保护与节约、污染的起因与危害、土地使用与控制、生活垃圾的分类与处置、环境标识等基本知识，帮助人们确立起环境概念，正确定位人在环境中的角色和作用。新闻媒体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起着导向作用，而新闻媒体的高消费、追求时尚的报道往往背离了其环境保护功能。

(5) 发挥民间环保组织的环境教育功能 环境保护是全民活动，不可能只由政府职能部门管理。公众的生态价值观正确与否，环境意识的高低，对生态环境保护起决定作用。我国应该有更多的民间环保组织，只有在公众参与、支持下，政府制定的环保措施、政策才能得到有效实施。要把对公众的环境教育作为一项重要而持久的工作开展下去，开展有计划、多层次的宣传教育活动。国外的许多民间环保组织机构严密、资金充足、规模庞大、成员多达几十万、几百万，往往能够形成一个强大的团体，影响政府的环境决策。我国民

间环保团体分散，参加的人数也仅几千人，之间的交流不充分，其职能既有差异，又有重合。如果这些民间团体组织能够有效地分工合作，将会发挥更大的环保作用。

(6) 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 在西方发达国家，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已经满足，正在致力于追求更高品位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公众推动政府的环境保护行为。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绝大多数人正在奔小康，环境意识还没有自发形成。因此，我国的环境教育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方针、政策推动环境教育。

把自然因素列入价值体系将完善传统的价值观；把自然价值纳入环境教育体系不仅完善现存的道德体系，而且将引起办学模式和办学方向的转变，引起人类知识体系的转变——教育体系不仅仅关注人类利益，而且将探讨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纳入其中。

【参考文献】

- [1] 罗尔斯顿. 哲学走向荒野[M]. 刘耳, 叶平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231.
- [2]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158.
- [3] 余谋昌, 王耀先. 环境伦理学[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226 —247.
- [4] 汤因比, 池田大作.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M].荀春生等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7.59.
- [5]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编. 21世纪议程[R].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译.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3,297.
- [6] 余谋昌. 生态哲学[M].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35—36.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732 电话与传真: 0086-10-85195511
电子信箱: cassethics@yahoo.com.cn